

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绩效研究

贺春临

摘要: 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 分析范式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表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在国外非常普遍,其不仅是银行微观经济理论的前沿课题,也是制定相关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在 Berger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适用的模型并进行回归,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共谋假说与有效结构假说在我国银行业并不存在;相反,高度垄断型市场结构与国有银行绩效低下并存是我国商业银行业独有的现象。为构建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业绩效优化和竞争力提高的有效市场结构,应扶持发展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业,扩大其规模,进行业务联合和重组;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正常市场淘汰机制。

关键词: 市场结构 市场绩效 高度垄断 规模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从理论角度来看,自美国经济学家贝恩首创“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S-C-P)这一分析范式以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产业组织学的研究重点。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产业组织学将银行业纳入了研究范畴(Berger, 1995;Gilbert,1984)。到了 90 年代,银行业的分析框架被建立在银行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之上(Hannan,1991;Calemand Carlino,1991),而后者则开始运用产业组织学的研究方法(BresnahanandSchmalensee,1987;Martin,1993)。至今,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 分析范式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表现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成为银行微观经济理论的前沿课题。

从实践角度来看,一方面,21 世纪是以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时代。这些特征在极大提升银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伴生更具破坏性、更加难以预测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成为必然趋势,这意味着国内银行业在进行适应改革深化需要的内部调整转型的同时,必须迎接来自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劲挑战。而能否有效预防新金融时代更难应对的金融风险,并在与国内同业及国外同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关键之处在于银行绩效的优劣。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存在着国有银行利润率水平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两个弊病。这二者恰恰是衡量绩效优劣的重要标志。而与国有银行绩效低下的症结相伴生的是其所占据的高度垄断地位。因此,对我国银行业高度垄断型市场结构与银行的绩效表现及二者相关度的研究应构成制定国内相关金融政策的基础。

但是,就目前国内学术界现状而言,对此问题的研究远谈不上系统深入。而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风雨,已经到了不能靠虚与委蛇的小修小补就能迎来明天的时刻,其改革成效直接牵系到我国经济能否享有长久的繁荣。因而,本文尝试在 Berger 模型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与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为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为构建有利于商业银行业绩效优化和竞争力提高的有效市场

结构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二、我国现阶段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实证研究

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不断变化:由垄断走向竞争;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功能狭窄走向健全完善,一个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相分离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银行业组织体系已然形成,它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以 4 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初步建立了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银行业市场体系。

以下将用产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Ratio,简称 CR_n指数)指标及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简称 H 指数)来定量分析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特点。

1. 对产业集中度指数的测定

CR_n 指数是指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几位企业的有关数值 X(销售额、资产额等)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计算公式为: $CR_n = \frac{\sum_{i=1}^n X_i}{\sum_{i=1}^N X_i}$ 。式中 CR_n 表示产业中最大的 n 个企业有关数值所占的市场份额, N 为企业总数。产业集中度指标因其简单易行而最为常用,它同时综合反映了企业数目及其规模分布这两个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但不能说明最大的 n 家企业的个别情况,也忽略了 n 家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的规模分布情况。本文主要测定我国银行业前 4 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在相应项目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即测定 CR₄ 指数值(见表 1)。

表 1 1995-2002 年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各类指标的指数值(%)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平均数
资产	78.47	83.70	86.35	88.27	89.32	89.07	91.01	92.39	87.32
存款	82.11	84.30	85.01	89.17	88.80	88.69	88.68	89.97	87.09
贷款	82.32	84.96	87.21	89.97	91.04	91.58	91.39	92.35	88.85
净利润	54.81	56.80	66.73	60.57	38.05	42.39	59.96	64.32	55.45

说明: * 各项目的总市场份额统计口径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

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等 14 家银行。采用此统计口径,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数据获取的难度;二是从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此 14 家商业银行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资料来源:据《中国金融年鉴》相关年份公布的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数据整理计算而成。

由表 1 可见,除净利润一项指标以外,资产、存款和贷款 3 项指标的 CR₄ 平均值都在 85% 以上,接近 90%。借鉴产业组织理论中以绝对集中度指标划分市场结构的“贝恩竞争结构分类法”对竞争结构进行分类,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垄断和竞争格局是极高寡占型(见表 2)。4 大商业银行作为国有独资的产权性质集体,在我国银行业中处于高度的垄断地位。

市场结构类型	市场集中度		该产业的企业总数(家)
	CR ₄ 值 (%)	CR ₈ 值 (%)	
极高寡占型	75 以上		1~40 家
高集中寡占型	65~75	85 以上	20~100 家
中(上)集中寡占型	50~65	75~85	企业数较多
中(下)集中寡占型	35~50	45~75	企业数很多
低集中寡占型	30~35	40~45	企业数很
原子型(即竞争型)	30 以下	40 以下	企业数极其多,不存在集中现象

资料来源:转引自夏大慰主编:《产业组织学》,31 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但从净利润的 CR₄ 值来看,平均仅在 55% 左右,这与 4 大国有银行资产、贷款和存款等 3 个指标均占 85% 以上市场份额的现状是不相符的,反映出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程度高而绩效低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已成为国内银行业市场的盈利主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外,从资产、存款和贷款的 CR₄ 的动态发展来看,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见图 1),表明了我国银行业的垄断在逐渐被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对手的实力也在逐步增强。而净利润的 CR₄ 值的发展趋势却与其他 3 个指标有所不同(见图 2),1995-1998 年该值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到 1999 年却有所回升,2000 年甚至超过了 1995 年的净利润水平。这是 4 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存款以及贷款份额不断下降的前提下所实现的净利润的增加,反映其通过改善经营提高了利润和绩效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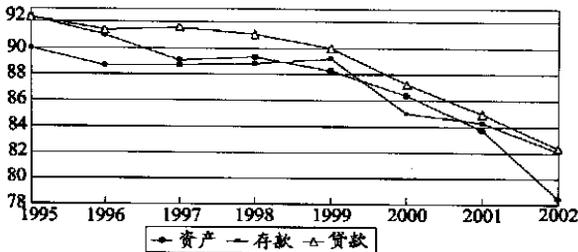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存款及贷款 CR₄ 值变化趋势图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平均值
资产	H 指数	0.2400	0.2414	0.2143	0.2112	0.2054	0.1999	0.2081	0.1767	0.2121
	N 指数	4.17	4.14	4.67	4.73	4.87	5.00	4.81	5.66	4.76
存款	H 指数	0.2270	0.2240	0.2302	0.2241	0.2240	0.2022	0.1954	0.1848	0.2140
	N 指数	4.40	4.46	4.34	4.46	4.46	4.95	5.12	5.41	4.70
贷款	H 指数	0.2401	0.2325	0.2352	0.2296	0.2266	0.2108	0.2015	0.1868	0.2204
	N 指数	4.16	4.30	4.25	4.35	4.41	4.74	4.96	5.35	4.57
净利润	H 指数	0.1491	0.1326	0.1283	0.1329	0.1646	0.1771	0.1245	0.1119	0.1401
	N 指数	6.70	7.54	7.79	7.53	6.07	5.65	8.03	8.94	7.28

资料来源:同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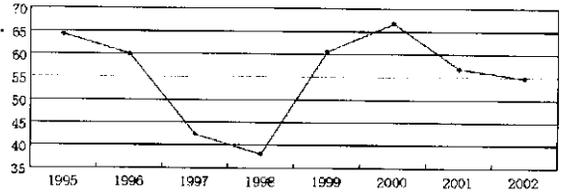


图 2 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 CR₄ 值变化趋势图

2. 对 H 指数的测定

前文的 CR₄ 指数并未说明几家大银行各自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及其他银行的规模分布。H 指数则较好地克服了 CR₄ 指数的上述不足,其计算公式为: $H = \frac{1}{n} \sum_{i=1}^n (X_i/T)^2$ 。式中 T 是市场总规模, X_i 是各个企业的有关数值, n 是该行业企业总数, X_i/T 为某一企业的市场份额。H 指数实质上是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其特点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H=0; 在完全垄断条件下, H=1; 在市场所有企业规模相同的情况下, H=1/n。一般来讲, H 指数越小,越接近于 0,表明市场竞争越激烈。

计算所得的 H 指数(N 指数是 H 指数的倒数,是一种“当量值”,可以辅助说明市场结构状况)通常比较小,在实际应用时一般乘上 10000。根据美国政策实践中运用的标准:如果 H 大于 1800, 该市场被视为高度集中的市场;如果 H 在 1000 和 1800 之间, 该市场属于适度集中的市场;H 小于 1000, 该市场被归入集中程度较低的市场。从表 3 显示的数据来看,资产、存款和贷款 3 项指标的 H 指数均在 1800 以上,属于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仅净利润 1 项处于 1000 和 1800 之间,可归入适度集中的市场范围(见图 3)。与 CR₄ 计算结果的期间变化趋势相似,我国商业银行业的资产、存款和贷款 3 项指标的 H 值整体上都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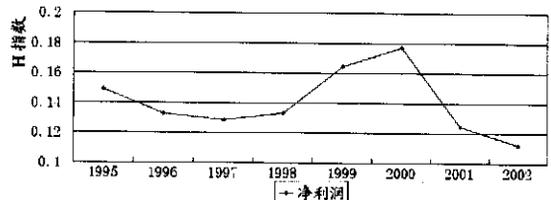


图 3 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 H 指数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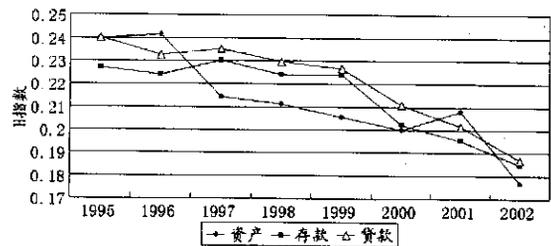


图 4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存款及贷款 H 指数变化趋势图

通过对 CR₄ 指数、H 指数和 N 指数的测定,可以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其结构属于高度垄断型,4 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拥有的市场权力长期以来居高不下。但是从动态发展来看,我国银行业正在经历由高度垄断向垄断竞争的结构转变过程。

三、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1. 市场结构与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说及其检验模型

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关系有两种假说,即传统共谋假说(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与效率结构假说。传统共谋假说(Bain,1951)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厂商理论的基础上,基本结论是特定行业中集中度与利润率正相关。该理论认为一个行业的市场结构决定其企业的行为;而后者又决定企业的绩效表现。若市场集中度较高,意味着存在少数较大规模、较高市场占有率的大企业,这些企业具有操纵市场的力量,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降低共谋成本,因此获得垄断利润。效率结构假说(Demsetz,1973,1974;Peitzman,1977)则认为,有效率的企业能够通过更高级的管理技术或生产技术来降低成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相应地也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结果导致更高的市场集中度。

Smirlock等(1984,1986)、Smirlock(1985)、Evanoff和 Fortier(1988)、Molyneux等(1994)采用如下模型对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均支持这两个假说:

$$= \beta_0 + \beta_1 CR + \beta_2 MS + X \dots\dots\dots (1)$$

其中 是企业绩效的测度(用资产收益率 ROA和资本收益率 ROE表示),MS是企业的市场份额,CR是市场集中度,X是一组与企业、市场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进入障碍、市场需求状况、成本差异、市场需求增长等。Smirlock(1985)指出,如果 β_1 显著大于零, β_2 等于零,共谋假说成立;若 β_1 等于零, β_2 统计上显著大于零,则效率结构假说成立。

但 Sheperd(1986)提出了修正的效率结构假说,认为绩效的变化应由效率和市场份额的影响来解释,因为市场份额含有与效率无关的因素,如市场势力或产品差异。Berger(1995)也在模型中加入直接测度的效率变量推导出一个简单的归纳方程以再次检验效率结构假说和共谋假说:

$$= \beta_0 + \beta_1 CR + \beta_2 MS + \beta_3 EF + X \dots\dots\dots (2)$$

这里 EF为 DEA模型直接测算的综合效率值。在对方

程 2 估计的基础上,有关绩效的不同解释假说可归纳如下(TimmeandYang,1991):

$$\frac{\partial}{\partial CR} > 0; \frac{\partial}{\partial MS} = 0; \frac{\partial}{\partial EF} = 0 \dots\dots\dots (3)$$

$$\frac{\partial}{\partial CR} = 0; \frac{\partial}{\partial MS} > 0; \frac{\partial}{\partial EF} > 0 \dots\dots\dots (4)$$

此处方程 3 表示纯共谋假说成立;方程 4 表示修正后的效率结构假说成立。

为考察商业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的相关性,本文在 Berge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以下模型并进行回归:ROA= $\beta_0 + \beta_1 OE + \beta_2 SE + \beta_3 CR + \beta_4 MS + \beta_5 F$ (模型各个变量的含义见下文),以检验传统共谋假说和效率结构假说在我国的适用度。

2. 模型的变量设置

(1)绩效变量。市场绩效实质上反映的是市场运行效率。产业组织理论主要从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利润率水平、销售费用水平以及技术进步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市场绩效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对银行绩效的测度一般采用以下 4 种指标: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息边际(NIM)、非利息收益率(NIR)。在这 4 种指标中,净利息边际 NIM是所得利息和所付利息之差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它能够反映银行对存款及贷款两种服务的定价能力。如果银行对它们的产品实行非竞争定价,净利息边际就会较高,这意味着银行支付了较低的存款利率和收取了较高的贷款利率;ROA与 ROE是常用指标,不仅包括了净利息边际收益,还包括了银行通过其他服务收取费用的能力;NIR则测度了非利息收入。由于我国还未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各商业银行尚无自主定价权。另外,我国银行事实上受到国家的完全保险,其自有资本多少并不影响银行的风险负担水平,不会影响银行资产与负债决策,从而对银行绩效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鉴于以上原因,本文的绩效测度主要采取总资产利润率指标(ROA)来衡量,其值等于银行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反映了总资产的获利能力,可用以衡量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而后者是银行业市场绩效优劣的重要标志。

(2)效率变量。本文的效率变量采用以 DEA方法测算的 1995-2000 年我国各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数据来表示。正确利用 DEA技术测定银行业效率应关注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合理定义投入与产出。关于商业银行存在的合理性的解释不同,对银行产出与投入的定义也不同。

表 4 1995-2000 年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变化表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4 大国有银行平均	综合效率(OE)	0.2832	0.2409	0.1791	0.1833	0.2859	0.3236
	配置效率(AE)	0.9103	0.9337	0.9416	0.9794	0.8161	0.9584
	纯技术效率(PTE)	0.8504	0.7496	0.6708	0.7709	0.7911	0.8506
	规模效率(SE)	0.3778	0.3687	0.3657	0.2829	0.4830	0.4047
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	综合效率(OE)	0.6385	0.6220	0.6017	0.5638	0.5824	0.6368
	配置效率(AE)	0.8801	0.8838	0.8822	0.9284	0.7529	0.8779
	纯技术效率(PTE)	0.8465	0.8185	0.8142	0.8101	0.8779	0.8841
	规模效率(SE)	0.8755	0.8637	0.8443	0.7792	0.8903	0.8191
全行业平均	综合效率(OE)	0.5438	0.5257	0.4981	0.4687	0.5082	0.5533
	配置效率(AE)	0.8882	0.8963	0.8971	0.9411	0.7687	0.8994
	纯技术效率(PTE)	0.8476	0.8013	0.7783	0.8003	0.8562	0.8751
	规模效率(SE)	0.7428	0.7399	0.7247	0.8551	0.7885	0.7086

考虑到数据的收集难度,本文将银行的投入定义为:(1)劳动力,为当年银行全体职工人数;劳动力价格是对职工的

劳动报酬支出。由于缺乏各家银行的详细资料,本文只能用银行营业费用指标度量总劳动报酬支出。(2)存款,考虑到

我国银行收入的 90% 均来自存款的利差,而且各银行之间规模的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吸收存款数额的不同,将各银行的存款总和定义为投入是合适的。(3) 其他各种固定投入,如建筑物、土地等,此处用各银行的固定资产净值来代替。本文将商业银行产出定义为银行利税额,等于银行税前利润与营业税及附加之和。

实证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中最具活力的是 10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综合效率最高;4 大国有银行的综合效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值和全行业平均值差距较大(见图 5)。由于效率计算公式为:综合效率 = 配置效率 × 纯技术效率 × 规模效率,而由表 4 可知,国有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与纯技术效率都很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效率低下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规模效率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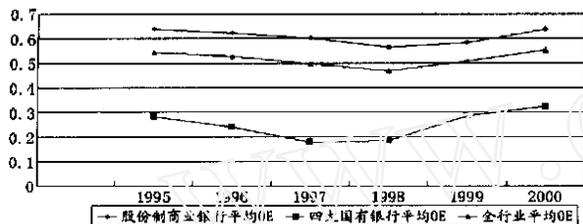


图 5 1995-2000 年商业银行综合效率走势图

(3) 市场结构变量。本文前部份主要采用了市场集中度 CR_4 及 H 指数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两个指标的计算结果基本相同,因此,这里采用各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存款及贷款的 H 指数的平均值表示整个银行业的集中度 CR;以各银行的总资产比率、存款比率及贷款比率的平均值代表该银行的市场份额 MS。

(4) 控制变量。在我们研究的 14 家商业银行中,4 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贷款及存款占了整个市场总额的 85% 以上,形成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为了反映了这一所有制特征,引入虚拟变量 FOUR(简称为 F)。如果银行为 4 大国有之一, $F=1$; 反之, $F=0$ 。若 4 大国有商业银行比其他股份制银行利润更高,则 F 的系数估计为正;但由于 4 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低下,获利能力较差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本文中 F 的系数估计为负号。

3.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的样本期为 1995-2000 年,样本为 4 家国有商业银行和 10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使用的数据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6-2001 年)中各家银行年末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整理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

$$ROA = -0.0538 + 0.4146OE - 0.0046SE + 0.0658CR - 0.001MS - 0.106F$$

$$(-3.684) \quad (3.824) \quad (4.112) \quad (-1.114) \quad (-0.097) \quad (-2.724)$$

$$F=14.146, R^2=0.7456$$

回归方程中,每一个系数表明了各变量对总资产利润率 ROA 的边际影响。括号里的数值为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的 t 检验值。从回归结果来看,由 $R^2=0.7456$ 说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对于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可知 CR 和 MS 项的系数都没有通过 t 检验,表明 CR 和 MS 对 ROA 的影响不显著,即共谋假说在我国银行业并不存在。

将 CR 和 MS 从上面的回归方程中去掉,再对 ROA 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ROA = -0.050 + 0.0146OE - 0.0035SE - 0.066F$$

$$(2.082) \quad (3.432) \quad (-2.815) \quad (-2.520)$$

$$F=15.357, R^2=0.8386$$

可以发现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上升(即 R^2 由 0.7456 上升到 0.8386),同时 OE 和 SE 的系数通过了 t 检验,说明 OE 和 SE 已经能足以解释 ROA,加入 CR 和 MS 对解释 ROA 没有帮助。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市场份额 MS 系数为负,且统计上不显著;而 OE 系数显著大于 0;SE 系数显著小于 0。这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影响银行绩效的主要因素是综合效率,其对银行绩效的边际影响为 0.4146。F 系数显著小于 0 ($-0.106, t=2.724$),表明 4 大国有商业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绩效的贡献较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贡献为小,也反映了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相对高效运作。

以上结果并不足以确定效率结构假说在我国银行业中是成立的,因后者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效率与集中度、市场份额正相关,因此,还应建立方程(5)及方程(6)并进行回归。

$$CR = \beta_0 + \beta_1 OE + \beta_2 SE + Z \dots \dots \dots (5)$$

$$MS = \beta_0 + \beta_1 OE + \beta_2 SE + Z \dots \dots \dots (6)$$

回归结果如下:

$$CR = 0.2226 - 0.0028OE + 0.0029SE$$

$$(75.228) \quad (-0.464) \quad (0.519)$$

$$F=0.142, R^2=0.0031$$

从回归结果来看,OE 及 SE 的系数均没有通过 t 检验。即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不显著。

$$MS = 0.123 + 0.065OE - 0.261SE$$

$$(6.842) \quad (1.771) \quad (-2.775)$$

$$F=23.808, R^2=0.6386$$

从回归结果来看,OE 项系数没有通过 t 检验,即综合效率对市场份额的影响不显著。SE 项系数通过 t 检验且为负,说明规模效率与市场份额负相关。

从以上实证分析来看,我国并没有出现效率结构假说中关于市场集中度与市场份额(CR 与 MS)内生于效率(OE 与 SE)的前提条件。因而实证结果否定了中国银行业存在效率结构假说。

综上所述,共谋假说与有效结构假说在我国银行业都不存在。相反,4 大国有银行的高度垄断地位与低经济绩效并存,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市场份额与绩效呈负相关,成为人所共知的中国银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究其原因,在于这种较高的集中度并不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源于某些政策因素;国有银行巨大的规模也并非由规模收益长期累积转化而来,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利润回报,银行业市场结构对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而有效结构假说和共谋假说不能成立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我国银行业高度垄断型市场结构及其低绩效的原因

1. 我国国有银行垄断地位形成和巩固的原因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国有银行在我国整个银行体系中占据了极高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的形成与巩固不仅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和历程紧密相关;而且符合国家的

效用函数及间接融资偏好;更适应了国有银行对规模的追求。

(1) 渐进式改革与国家金融产权垄断的追求

国有银行高度垄断地位的形成是由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和历程所决定的。渐进式改革导致政府储蓄余额及财政收入下降;加之国家追求对金融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形成了“弱财政”与“强金融”并存的格局;后者又使得高度集中的国有银行体系成为国家实现金融垄断的最佳选择。

改革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改革初期,国家是主要的储蓄者与投资者,从1981年开始居民部门逐渐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拥有者。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86910.65亿元;而我国的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4.8%急剧下降到2002年的18.5%,说明经济剩余已从原来的国家集中控制逐步转化为民间分散拥有,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金融资源的分散化。

国家的效用函数对于垄断产权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追求,其一是对产权存量的垄断,意味着国家追求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向社会产出剩余的支配权;其二是对产权增量的垄断。国有金融制度的安排最初是国家在追求垄断产权的过程中,作为给国有企业供给资金的配套单位而设立的。改革过程中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化愈加刺激了国家对国有金融产权的偏好,促使其用金融制度替代部分财政功能来动员金融资源,导致了“弱财政”与“强金融”并存的格局(参见表5)。因而,当其他国有产权形式开始调整、重组和相对收缩时,国有金融产权形式却经历了迅速的扩张,这种扩张集中体现在国有银行组织体系的重构及其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上。前者以中国人民银行脱离财政部为标志,经历4大国有银行的先后重建及其分支机构的迅速扩展,构建了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组织体系;后者则体现为国有银行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吸纳。由于中央银行制定的利率和信贷政策的刺激,加上居民对国有银行体系的高度信任以及可选择的金融资产有限,一个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资源配置体制即告形成。

表5 我国的“弱财政”与“强金融”格局(%)

	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	居民储蓄占 GDP的比重	贷款占 GDP (GDP)的比重
1987	19.5	27.19	82.71
1988	16.8	27.02	76.17
1989	16.7	32.18	79.16
1990	16.3	39.75	87.16
1991	14.57	42.75	92.16
1992	13.08	44.14	90.3
1993	12.56	43.90	84.32
1994	11.19	46.16	91.27
1995	10.71	50.91	87.55
1996	10.87	56.82	90.21
1997	11.6	62.15	100.19
1998	12.6	68.17	108.76
1999	13.9	72.65	114.23
2000	15.0	71.93	111.15
2001	17.1	76.89	117.08
2002	18.5	84.88	136.53

注:财政收入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自1992年开始到2002年为各数值对GDP的比值。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出。

(2) 国家的间接融资偏好及国有银行的规模经济偏好。

001

在全社会可融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外源融资是通过间接方式还是借助直接方式,对银行规模的形成及银行市场集中程度的作用是迥然不同的。如果间接融资方式占主导,无疑将为银行规模的扩展和市场的集中创造条件。而我国较长时间里一直维持着对间接融资的偏好(见表6)。如上文所分析的,由于“弱财政”与“强金融”同时并存,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效用函数,就必须控制对扩张的金融资源的支配权。若增加直接融资份额,势必分散居民的储蓄存款,而国家为了获得同样的融资规模必然付出更高的成本;此外,发展直接融资需要高效率的资本市场,这在改革初期无疑力不能及。因而,采用国有银行对企业进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是国家控制金融资源支配权的最有效途径。

表6 我国融资总量及结构(1987-2002年)

年份	直接融资		间接融资	
	绝对数 (亿元)	相对数 (%)	绝对数 (亿元)	相对数 (%)
1987	528.61	5.13	9766.30	94.87
1988	972.94	7.83	11455.90	92.17
1989	1260.92	8.65	13313.90	91.35
1990	1767.30	10.44	15166.80	89.56
1991	2268.53	11.02	18316.97	88.98
1992	2447.10	9.75	22659.37	90.25
1993	2881.29	9.47	27579.90	90.53
1994	4154.10	10.23	36548.00	89.77
1995	4823.19	9.78	44483.90	90.22
1996	5644.9	9.41	54198.90	90.59
1997	7588.12	11.95	74914.1	88.05
1998	8112.2	11.01	86524.1	88.99
1999	12505.8	11.77	93734.3	88.23
2000	19651.1	16.51	99371.1	83.49
2001	22112.7	16.45	112314.7	83.55
2002	23785.8	14.54	139803.0	85.46

注:直接融资指《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平衡表》中所列的有价证券及投资的年末余额;间接融资指贷款的年末余额。

资料来源:依据各年《中国金融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

同时,国有银行对规模的偏好也是导致其规模扩张和市场集中行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从理论上分析,由于银行是国民经济中一个以分配稀缺资源——资金为主要功能的部门,银行产品相对于一般商品具有同质性,因而其前期投入成本相对于工业企业为低;并且商业银行扩大经营规模只需扩大单位业务规模和增加营业网点即可,不像工商企业要受到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限制。所以,商业银行具备增加分支机构、扩大经营规模的内在动力^①。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首先,4大国有银行成立时已拥有近乎100%的市场份额,业务条块分割,几乎不存在竞争,容易扩张规模。而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以尽可能多地吸收储蓄资金投入国民经济各部门为己任。二者均成为国有银行重数量、轻效益的重要原因。

其次,由于国有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弥补国家财政不足的部门,其规模扩张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政府往往使用存款规模作为国有银行经营绩效的衡量标准,这使得国有银行不是为了“规模的经济”,而是为了“经济的规模”来追求资产的增长和组织机构的扩张。

第三,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的福利待遇等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而分支机构拥有贷款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出于对金融资源支配权的强烈追求必然要求分支行扩张本地区组织机构的数量及增加贷款规模。

2. 我国国有银行低市场绩效的表现及原因

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多年来我国的银行体系在追求稳定性的同时,伴随着国有银行绩效低下,也即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的弊病。我国国民经济的再生产可以归纳为银行借贷间接融资型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策干预,成本限制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民营企业成了被国有银行遗忘的角落。资料显示,目前,非国有经济部门贡献了74%的工业增加值和63%的GDP,实际得到的贷款却不到银行贷款总额的30%^④。如此现状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双重低效: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资产盈利率长期低于银行的贷款利率,无法维持正常的还本付息的资金信贷循环,导致国有企业资产结构中的过度负债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重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却因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而错失若干发展良机。这种金融资源配置的双重低效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发展与稳定。

我国国有银行绩效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

(1) 金融结构^⑤与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发展。表现在:其一,金融资源的逆经济结构配置;其二,非国有金融的制度性供给不足与市场巨大需求之间的反差;其三,金融组织的单一性与经济结构多元化的矛盾等等。三者最终都表现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2) 国有银行的规模不经济。如上文所分析的,从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外部因素来看,我国4大国有银行具有天然的垄断优势。不过这种垄断并非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厂商垄断,而是行政性垄断。正因为如此,这种垄断并不必然带来规模经济,相反带来了规模不经济。其一,国有银行规模的扩张导致管理层次增加,带来了计划与控制的复杂化等负效应,严重降低了银行的效率。其二,在政府垄断条件下,4大国有银行所获得的收益持续高于社会平均收益,从而扭曲了激励信号,使其无需关心成本的下降及服务质量与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失去竞争活力,缺乏创新动机。其三,在银行可分配资源短缺条件下所形成的行业垄断会因排队、配给、黑市等原因而导致交易费用提高。其四,4大国有银行存在整体规模偏大而人均和机构平均规模偏小的矛盾,是其竞争力低下,规模经济效应无法体现的重要原因。

五、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银行业绩效

1. 提高我国银行业市场绩效的切入点

关于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切入点问题,一直以来学界存在着产权结构改革与市场结构改革,或曰内部改革(存量改革)与外部改革(增量改革)之争。前者是指对国有银行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造以改善其治理结构^⑥;而后者则是指放松我国银行业进入管制,不剥夺中小银行、民营银行作为“草根金融”的权利及其“鲑鱼效应”的发挥,以改善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条件与市场结构^⑦。

无可否认,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国有银行的产权多元化改造的确能够激励其提高效率(这也是我国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本文认为,作为掌控金融资源配置权的部门,产权多元化改革改变国有银行内部激励机制,只构成提高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而充

分条件则是优化银行业外部市场结构,改善其竞争环境。具体而言,就是在国有银行之外增加信贷提供者的数目,让更多的非国有银行进入市场,后者对消除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具有决定性作用。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小数目条件”(Williamson,1975)不难推断,在金融产权结构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市场上提供信贷的金融组织的数量。即使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存在着若干个商业化了的国有银行,其结果也只是形成了若干个垄断信贷提供者。从理论上讲,银行业市场结构越是垄断,市场的交易费用就越高,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也就越失灵。

因此,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绩效,必须以改变市场结构为切入点。相对于国有银行内部改革及放松信贷约束,先积极发展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等非国有金融机构,可能是一条更符合中国金融体系变迁逻辑的路径。

2. 提高我国银行业市场绩效的政策建议

首先,针对4大国有银行市场集中度过高和规模不经济的弊端,应积极扶持和发展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大其经营规模,鼓励其进行业务联合和重组。在规范市场准入的前提下,推动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竞争中找准市场定位;适当扩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服务网络,完善其服务功能和组织机构,提高其综合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接管国有银行的某些分支机构乃至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这样既可解决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过小、分支机构不足的问题,又可适度收缩国有银行的规模边界,使后者的规模效应得以发挥,从而使得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进而促成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优化和市场绩效的提高。

其次,针对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非均衡性及非国有银行比重过小的弊端,应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发挥其“补血”功能。由于我国4大国有银行的“瘦身”和邮政储蓄对基层的资金“虹吸”,使得原本困顿不堪的基层金融又面临着更加难以解决的资金“失血”现象,迫切需要民营银行能够进入政府的视野。民营银行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解决目前最为困难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会打破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大一统格局,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化的地方性金融市场体系,使得整个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最后,鉴于4大国有银行对资产和市场的绝对控制,使得现有的竞争格局呈现一种非有效状态;加之信贷利率仍由中央银行控制,银行不是在价格上竞争,而是在关系和规模上竞争,使得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难以与国有银行抗衡。因此,在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同时,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和法规,建立正常的市场淘汰机制,以防止不正当、不公平的竞争是当务之急。

注释:

市场结构的一般定义是指特定行业中企业的数量、规模、份额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主要由规模经济、进退壁垒以及市场集中度等因素所决定。

市场绩效则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企业在价格、产量、利润、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所达到的现实状态。

市场份额高的银行可能有高质量的产品,使它们能定较高的价格,获取较大的利润。

Berger模型的介绍推导主要参考:Berger,A.N.,1995. "The

DEA(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一种线性规划技术,指由 A-charnes 和 W.W.CooPer 等人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最常用的非参数前沿效率评价方法。最初由 Sherman 和 Gold(1985)将之用于银行业。DEA 可计算给定样本中多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值,其方法是将样本中每个机构的投入产出进行加权平均后与样本中的最佳机构相比,由此得出样本中哪些机构有效哪些无效。其主要的思路为:设定有 m 种非负投入品 $X=(X_1, X_2, \dots, X_m)$ R^m 以及 K 种非负产出品 $Y=(Y_1, Y_2, \dots, Y_k)$ R^m 。再假定我们有 n 个样本企业,每个企业都利用投入品 X 生产 Y ,那么符合规模报酬恒定条件下的投入、产出转换集可表示成为: $Q=\{(X, Y) \in R^{m+1} \times Y \mid YZ, XZ, X, Z \in R^m\}$ 。其中 Z 为密集向量,表示一种特定的活动被利用的密集程度。接下来便在给定限制的前提下求解一个线性规划问题,以便使最大化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达到最大化。

厂商的绩效可以由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来衡量。投入产出之比通常为一个重要的指标。银行业绩效研究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其投入和产出。正因如此,评估银行业市场绩效的方式才无法获得一致的意见,衡量方法也多种多样(Wheelock and Wilson, 1995; Colwell and Davis, 1992)。严格地说,ROA 并不是衡量银行绩效的最适合指标。现代金融理论已经发展出了许多更为合理有效的指标体系以衡量银行绩效。但考虑到数据采集的困难,本文拟用 ROA 对商业银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即绩效进行测度。

银行效率的研究方法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其出发点就是构建一个生产前沿面,某企业与该前沿面的距离就是这个企业的技术效率或称前沿效率。Berger 和 Humphrey(1997)对涉及 21 个国家的 130 项关于金融机构效率研究方法及结论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其中两种非参数的方法分别是 DEA 和无界分析方法(freedisposal hull-FDH 方法,亦称自由支配壳方法)。两种参数方法分别是随机前沿方法(distribution free approach-DFA 方法)以及厚前沿方法(thick frontier approach-TFA 方法)。其中 DEA 方法最为常用,是一种与传统计量经济方法并驾齐驱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采用此法测算商业银行的效率。

对银行投入及产出进行定义的常用方法大致可以分为 3 种:生产法(PA)、中介法(IA)和资产法(AA)。在生产法中,银行被认为是金融产品的生产者,因此银行产出为存款账户的数量贷款业务的笔数。银行的投入为资本和劳动力。在中介法中,银行被视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机构,存贷款金额均作为其产出,投入一般选择为资本和劳动力。在资产法中只将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作为其产出,而不计负债。

由于使用生产法时,必须知道银行业务的数量,而这一数据较难得到,故本文不采用这种方法。在中介法和资产法中,都直接把贷款的数量作为银行的产出,这实际上没有把贷款质量的差异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我国的国有独资银行长期以来都承担着一部分政府职能,产生了许多体制性不良贷款,各家银行间的贷款数量上的差异很少仅仅由技术和市场所决定。因此,直接把贷款数量作为我国银行产出不合适。

本回归的数据处理使用 SAS 统计软件。

企业对于金融资源的取得主要通过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途径。内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自我积累从内部获取资金,在现阶段这种方式并不在我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中占优势,外源融资目前主要是主要的融资渠道。

①黄铁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研究》,95 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②樊纲:《发展民间金融推动金融改革——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考》,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06-09。

③本文所使用的金融结构与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其名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所使用的“金融结构”有所不同。后者指的是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戈德史密斯,1968);这里的金融结构主要是金融业的市場结构及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含义。

④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劉偉及黃桂田(2002),其對運用 SCP 框架及其從市場結構的角度揭示中國銀行業主要問題的思路及提煉出的政策含義提出了批評,認為在現代技術不斷改變着銀行運作機制、主要發達國家的銀行業的行業結構進一步向集中化發展、各個銀行在努力追求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应的背景下,中國銀行業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度是符合國際銀行業發展趨勢的。中國銀行業的主要問題是國有銀行產權結構單一,而不是

行業集中的問題。以市場結構為突破口的改革將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的震蕩。正是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與市場份額集中於帶病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側重點就不能以市場結構的調整為起點,而是相反,要充分利用進入 WTO 後的有限的過渡期,在國有銀行的市場份額發生顯著萎縮之前,堅決地進行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努力避免潛在金融風險的總爆發。詳見《中國銀行業改革的側重點:產權結構還是市場結構》,載《經濟研究》,2002(8)。

⑤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於良春、鞠源(1999);焦瑾璞(2001);易綱、趙先信(2001);林毅夫、李永軍(2001)。他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一方面,中國銀行業存在高度集中和國有銀行壟斷低效率問題,因而放寬行業進入管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另一方面,銀行機構的規模與非金融性企業的規模是非對稱性的,中國銀行業的行業結構與中小企業融資狀況存在衝突,認為中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一個突出弊端是中小型銀行發展不足,金融資產過度集中於大銀行,不利於中小企業的融資,其政策建議也是集中在放寬行業准入上。詳見於良春、鞠源:《壟斷與競爭: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載《經濟研究》,1999(8);焦瑾璞:《中國銀行的市場競爭格局及其制度分析》,載《宏觀經濟研究》,2001(6);易綱、趙先信:《中國銀行競爭:機構擴張、工具創新與產權改革》,載《經濟研究》,2001(8);林毅夫、李永軍:《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載《經濟研究》,2001(1)。

參考文獻:

1. 於良春、鞠源:《壟斷與競爭: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載《經濟研究》,1999(8)。
2. 楊文捷:《市場競爭結構與銀行穩健》,載《決策借鑒》,2000(12)。
3. 易綱、趙先信:《中國的銀行競爭:機構擴張、工具創新與產權改革》,載《經濟研究》,2001(8)。
4. 胡炳志:《論銀行業的有效結構和競爭模式》,載《經濟評論》,2000(2)。
5. 黃金老:《論金融脆弱性》,載《金融研究》,2001(3)。
6. 魯迪·多恩布什:《化解中國的銀行不良債權與防范金融風險》,載《金融研究》,1999(5)。
7. 胡祖六:《中國的銀行體系改革:一次新的長征》,載《國際經濟評論》,2000(7)。
8. 王佩艷、耿強、汪建:《融資模式效率比較與我國融資模式的選擇》,載《財經研究》,2000(8)。
9. 張健華:《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研究的 DEA 方法及 1997-2001 年效率的實證分析》,載《金融研究》,2003(3)。
10. 楊學兵、張濤:《銀行間債券市場的 SCP 分析》,載《金融研究》,2003(3)。
11. 張杰:《中國金融制度的結構與變遷》,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12. 金運、陳辛:《銀行再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3. 黃鐵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運行機制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
14. 張杰:《中國金融成長的經濟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
15. 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理論和中國金融發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16. 羅納德·麥金農:《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7. Bertscholtens, Dick Van Wensveen, 2000. "A Critique 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4, pp. 1243.
18. Niels Hermes, Robert Lensink, 2000. "Financial System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4, pp. 507-524.
19. Bain, J.S., 1956. Barriesto New Competitions. Cambridge, MA. Harrard University Press, p. 3, p. 114, p. 13.
20. Urban, G.; Carter, T.; Gaskin, S. and Mucha, Z., 1984. "Market Share Reward to Pioneering Brands." Management Science, p. 32, p. 645.
21. Hellman, T.; Murdoch, K. and Stiglitz, J., 1997. "Financial Restraint: Toward a New Paradigm." in M. Aoki, H. Kim and M. Okuno Fujiwara, ed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larendon Press, Oxford.
22. Stiglitz, J. and Weiss, A.,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June).

(作者单位:招商银行总行研究部 深圳 518040)
(责任编辑:Q)